



南梁精神与红船精神一脉相承的当代启示

□ 朱健

——学习习近平对以上两个革命精神阐释的思考

2005年6月21日,时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的习近平,在《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的署名文章,首次提出并阐释了红船精神,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源头精神,将其概括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2009年6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视察庆阳南梁革命纪念馆时指出,“在血与火的斗争中铸就的革命精神,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给庆阳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办好,大力传承南梁精神,使其发扬光大”,“要对南梁的革命历史好好研究,突出‘落脚点’‘出发点’和‘硕果仅存’的研究”。

习近平同志对红船精神和南梁精神的阐释,为我们学习、研究和掌握红船精神和南梁精神的实质提供了基本思路。

一、南梁精神与红船精神立论形成的相似之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程艰苦卓绝,在斗争中培育出的革命精神也是多姿多彩。形成共识并得到广泛宣传的革命精神已有很多:以人物高尚品德立论的,有白求恩精神等;以地区革命精神的特点立论的,有红岩精神等;以重要会议立论的,有遵义会议精神等;以在非正常状态下执行非常任务、表现出的非常精神面貌立论的,有“两弹一星”精神等;表现革命历程的,有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随着党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还有一些新的革命精神正在陆续被总结和提炼出来,红船精神和南梁精神即是其中之一。

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爆发,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条件。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浙江嘉兴南湖一条游船上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通过了党的纲领,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中国共产党引领革命的航船,劈波斩浪,开天辟地,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驾驶这条红船扬帆起航,在推动中国历史前进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领导核心作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既是一个创新创业的过程,也是一个伟大事业起航的开端。一个大党诞生于一条小船,红船精神因此成为对中国共产党诞生时期实践和理论的高度概括和形象表述。

陕甘革命根据地之所以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一批革命家及根据地广大军民始终坚持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坚定信念和奋斗精神。他们曾先后组织领导了七十多次武装起义,并在陕甘地区开展了广泛的兵运工作。虽然屡遭失败,但刘志丹、习仲勋等人注重从陕甘实际出发,注意吸取根据地曾经丢失的血的教训,自觉抵

制和克服各种错误思想,从而坚持了陕甘边区的游击战争,保证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的工农武装割据斗争在实事求是的方针指引下,进入了大发展的辉煌时期。南梁精神也由此成为对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斗争实践,对陕甘苏区革命精神、优良传统、优良作风的理论提炼,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

红船精神属于以重要会议立论的一类,南梁精神属于以地区革命精神的特点立论的一类。这两个革命精神虽然在类型上不属于一类,在时间上也没有接续的关系,但它们却在立论形成的过程中具有几个相似之处:

首先,两个革命精神都被认为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红船精神弥补了党在创建时期革命精神历程的缺失;南梁精神弥补了长征精神与延安精神两者之间的承上启下的革命精神的缺失。

其次,两个革命精神到目前为止传播面都不够广,还处在对其精神内涵、实质及源流的系统分析和论证之中。如中共一大是在上海和嘉兴南湖两地召开,用嘉兴“红船”作为唯一标志是否合适?长征精神与延安精神中间是否缺少一个过渡?用“南梁”代表是否合适等。

其三,两个革命精神都是在习近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前,就得到了他的充分肯定的,习近平就其历史意义和对现实的作用分别进行过阐释。

尽管红船精神和南梁精神在理论上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从其精神内涵和历史意义看,两个革命精神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中国革命精神之链中不可或缺的精神环节。

二、南梁精神与红船精神对传承党的先进性做出了贡献

历史已经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纠正自身错误的基础上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并且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实现中国梦的康庄大道。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红船精神’是激励我们把握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和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大胆探索、创新创业的强大思想武器。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一大主题,也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首要任务就是提高领导发展的能力”。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给中国未来发展带来了新的选择,这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尽管后来的历史表明,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不能走笔直的发展道路,而必须先进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后才能通过社会主义改造逐步确立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而且中国自1956年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的历史还表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模式,而要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切认识,都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也只有在这以后才能取得。

然而,这一切认识的起点,都源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所确定的根本方向: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全党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始终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上锐意进取,不断创新,在建立革命武装、创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实行统一战线、加强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都有创新性的发展。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成功道路被总结为全国武装斗争中的“陕甘模式”。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制定的一系列经济社会政策,讲求实际,具有开创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使根据地进入了繁荣发展的重要时期。如:包家寨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决定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师,向陇东南梁进军,坚持在陕甘边界桥山山脉中段的南梁地区建立中心根据地,开创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划分陕北、陇东、关中三个游击战略区,以扩大红军的回旋余地,同时又共同以南梁为中心向南北发展。毛泽东赞扬说,刘志丹用“狡兔三窟”的办法建立根据地,很高明。这些都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和区域特色,是对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大贡献。

陕甘边区共产党人始终依靠人民的力量来开展武装斗争,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真正做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根据地党的领导人始终把建立人民政权、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作为革命的根本目的。他们充分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真心关心群众,选举群众代表参与政府重要工作、参加政权建设和社会事务管理,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和谐生动局面。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制定的土地革命、发展生产、设立集市、发行边币、保护小商贩等一系列政策、法令和措施,都坚持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集中反映了人民的利益,赢得了边区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也为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坚实保障。

三、南梁精神与红船精神在新实践中的弘扬

红船精神第一次将实现中国梦建立在科学理论指导的基础之上。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红船精神’是我们党创立时期坚持和实践自身先进性的一个历史明证。正如党的先进性不是与生俱来、一劳永逸的,‘红船精神’也是具体的、历史的。我们要把‘红船精神’贯穿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实践上来。把握住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红船精神’的实质与核心,同时也就把握了党的先进性的真谛”。

中国梦的实现要靠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国梦,必须继承和弘扬中国革命精神。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英雄记忆,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革命精神。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南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这些精神都是中国革命精神的主要组成部

分,其先进性都是一脉相承的。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塑造的中国革命精神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体现。在进行中国革命精神的研究和宣传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把整体优势与各纪念地的个性化优势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发挥各自优势的基础上就如何做到优势互补下功夫。一方面,没有涓流难成大海;另一方面,潺潺涓流只有汇入海才能充分地彰显其价值,在奋力实现中国梦的重大下,尤其需要具有这样的胸怀、这样的抱负、这样的眼光。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党的建设做了重要部署,其中,党的建设的主线就是“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

面向群众,是南梁精神的根基,是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坚持以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诚心实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群众观念,是陕甘革命根据地早期的缔造者们在反复失败中总结达成的共识,也是后来陕甘革命根据地成功创建的重要经验。坚守信念,是南梁精神的核心,是陕甘边区共产党人走向胜利的伟大旗帜,也是当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力量源泉。顾全大局,是南梁精神的特质,是陕甘边区党组织坚持党的先进性原则的具体体现,也是当前老区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求实开拓,是南梁精神的精髓,是我们党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也是我们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方法路径。

进入新时代的今天,浙江作为中国革命红船的起航地、改革开放的先行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萌发地,当好学习弘扬红船精神的排头兵责无旁贷。浙江全省人民正在以坚持和发扬红船精神、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自觉践行“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勇立潮头方显担当”的新期望,全面推进“八八战略”再深化、改革开放再出发,加快“两个高水平”建设,努力为新时代大力弘扬红船精神做出应有贡献。

南梁精神是党的思想理论的源头活水之一,是延安精神的源流之一,是甘肃重要的红色基因和最靓丽的红色名片。传承弘扬南梁精神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生动检验,是提振信心、增强斗志的迫切需要。正如2019年3月7日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甘肃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的,希望甘肃广大干部群众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全力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着力深化改革、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大环境保护和整治力度、加快社会事业发展,不断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

总之,我们将在新的实践中继承和弘扬红船精神和南梁精神,在许许多多的革命精神的激励和鼓舞下,不断强化前列意识,切实把“走在前列”的要求体现到精神状态上,贯彻到衡量标准上,落实到各项工作上,再接再厉,乘势而上,努力为全国大局做出积极的贡献。(作者系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巡视员)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四辑)

南梁精神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廉政文化

□ 杨树霖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老一辈共产党人,带领陕甘边区广大军民浴血奋战创建并巩固发展起来的,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红色区域,为中国革命胜利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并孕育形成了伟大的南梁精神,作为苏区精神地域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在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刘志丹、习仲勋等积极开展廉政文化建设,保持了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有效防止了党和红军干部队伍中某些腐败现象的发生,保持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清正廉洁,促进了苏区干部作风的转变。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廉政文化突出反映了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忍辱负重的大局意识以及求真务实的革命精神。因此,有必要研究和探讨南梁精神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廉政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廉政文化在南梁精神内涵上的表现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廉政文化与南梁精神之间是互为一体、密不可分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廉政文化通过南梁精神的内涵表现出来。

其一,以坚定信念为思想基础的廉政文化

廉政文化建设,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基础。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在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过程中,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坚守革命初心,构成了南梁精神的重要内涵。刘志丹作为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对敌斗争中先后两次被捕,在党内斗争中多次被错误地降职、批评、处分,他都能坚持真理,从无怨言,更不计较职位高低。特别是在“左”倾路线执行者对陕甘根据地的错误肃反中,他身陷囹圄,却仍然对身边的同志说:“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的。”习仲勋同样经历了非同寻常、难以承受的考验,但他忍辱负重,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从思想上保证了共产党员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从行动上强化了革命事业必胜的坚定初心。

其二,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廉政文化

毛泽东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千万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刘志丹、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始终严守纪律,始终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同群众生死相依,血肉相连,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真挚拥护和爱

戴。红军行军打仗,从不骚扰百姓,缴获敌人的物资,除武器外,粮食、衣物大部分分给劳苦群众。红军纪律严明,爱护百姓,老百姓把红军作为自己的子弟兵,争着为红军送信、带路、抬担架,不论红军到哪个村子,群众都是争着把红军带到自己家中住宿。南梁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措施,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选举群众代表担任政府职务、参与政权建设和社会管理,刘志丹、习仲勋等根据地领导人加强廉政建设,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自觉接受人民监督,把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作为廉政文化建设的头等大事。

其三,以作风建设为基本遵循的廉政文化

毛泽东曾盛赞中华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正是这种艰苦卓绝的环境锻造出来的钢铁队伍,造就了日后一支无坚不摧的力量。在陕甘边根据地创建初期,物资严重匮乏,党政机关和广大军民的生活极其困难的,许多当地干部从家里“自带干粮去办公”。在南梁,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来规范干部行为,维护群众利益,使边区政府成为当时深受边区军民拥护的最民主、最清廉的政府。陕甘边党政军领导人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生活中没有一点特殊,经常自己动手做饭、炒菜、喂马、抬伤员,留下了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正是因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这种优良作风和精神财富,才造就了“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重要的传承结合点。

其四,以规矩约束为制度建设的廉政文化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党的廉政工作,离不开健全的法制法规和制度约束,制度建设是保持党政机关廉洁奉公的重要保证,可以减少乃至消除滋生腐败的土壤。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刚成立,刘志丹即强调:“群众最痛恨反动政权不廉洁、无人不贪。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有骨气,要讲贞操,受冻挨饿也不能取不义之财。”红二十六军还制定了《暂行条例十八条》,其中规定:临阵脱逃者判死刑,破坏武器者判死刑,强奸妇女者判死刑,缴获胜利品不交公者视其情节轻重判劳役或死刑。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公款十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五元以上者开除党籍,贪污五元以下者开除军籍。习仲勋组织制定的《赤卫军暂行简明军纪》规定:“侵犯劳苦群众利益者处死刑”“强奸妇女有证据者处死刑”“强奸未遂者罚苦役半年”“无故打骂劳苦群众者酌酌情轻重罚以1月以上3月以下之苦役。”南梁政府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针对个别违反党纪的贪腐分子,苏维埃政

府坚决打击,绝不姑息。廉政制度建设有效地保障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期廉洁高效政府的建设与反腐败斗争的成效,这既是南梁精神的特质之一,也是根据地廉政文化的重要内容。

二、南梁精神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廉政文化的内在关联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宝贵遗产,特别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南梁精神与陕甘边根据地时期的廉政文化都是我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基因,两者存在着内在关联性。

首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廉政文化囊括在南梁精神的特质之中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廉政文化是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廉政建设与文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拒腐防变的第一道防线,也是南梁精神特质的体现,对促进党员干部清正廉洁具有重要意义。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孕育的南梁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初,就把防范贪污腐败,树立廉洁政风作为政权建设的头等大事,制定干部贪污公款十元以上者处以死刑的法令,有效预防和遏制了腐败问题,树立了党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刘志丹、习仲勋领导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党和苏维埃政府,以清正廉洁的形象屹立在西北大地上,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支持,拥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革命文化源泉,集中体现了陕甘边党和红军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其次,南梁精神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期优秀廉政文化的理论精髓和思想源泉

南梁精神是陕甘边根据地廉政文化的理论精髓和思想源泉,南梁精神蕴含着伟大崇高的理想信念,这种理想信念突出表现在越是困难时期,共产党人对革命的信仰越执着,革命的意志越坚定,初心不改,为了实现伟大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敢于拼搏,甘于奉献,勇于牺牲。南梁精神能够激发出坚强不屈的信念精神。既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廉政文化的理论精髓,又是“为民、务实、清廉”廉政文化理念的根本源泉,顺应了时代发展要求,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借鉴。

再次,南梁精神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廉政文化建

设的精神宝库

中国共产党从建立到不断发展壮大,有内在的精神基因,不断地为其注入精神营养。南梁精神作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廉政文化建设的核心“正能量”,既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精神食粮,也是新时代廉政文化建设的核心精神指南。陕甘边根据地革命先辈之所以能在艰难困苦中坚持下来,靠的就是南梁精神所蕴含的坚定信仰和大气精神。我们必须倍加珍惜南梁精神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用南梁精神的巨大能量继续推进新时代廉政文化建设不断走向深入。

三、激活南梁精神内涵,服务新时代廉政文化建设的现实思考

南梁精神是陕甘边根据地廉政文化的理论精髓和思想源泉,通过激活南梁精神内涵,能够释放陕甘边根据地廉政文化的核心正能量,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一是激活南梁精神内涵,必须坚持“守初心”和“担使命”。既要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不忘初心,不忘革命宗旨,又要适应新时代廉政文化建设的历史使命。新时代廉政文化建设更需要激活南梁精神内涵,充分吸收南梁精神的营养和能量,充分发挥南梁精神在革命传统和廉政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激发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文化引领,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提供精神养料。

二是激活南梁精神内涵,必须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和党员干部的自身能力建设,永葆党的先进性。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中,刘志丹、习仲勋等正是依靠严明的纪律和优良的作风,才使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数次军事“围剿”,孕育形成了光芒四射的南梁精神,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廉政文化一道,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营养。

三是激活南梁精神内涵,必须将老一辈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同新时代廉政文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让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彰显出新的时代价值,并且发扬光大。进入新时代,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发生了重大变化,担负的历史任务和使命极其繁重,面临的历史考验更加严峻,我们必须激活南梁精神内涵,深度挖掘南梁精神蕴含的丰富廉政文化思想,以更好地指导和服务新时代廉政建设实践。(作者系沈阳市范仲淹研究会副秘书长、辽东学院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四辑)